

# “故宫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座谈会” 纪要

张 露 整理

2010年4月“故宫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座谈会”在故宫博物院召开，多位学者就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首倡的“故宫学”展开热烈讨论，挖掘“故宫学”的内涵和外延，总结既有学术成果，畅想其未来发展前景。本刊特据记录摘要发表。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学”首倡者）：**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参与故宫学的讨论！关于故宫学的座谈会，我们2005年开过一次，这次应该说是第二次了。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在座的好多都是我们的同行，做的基本都是对历史、文物、文化的研究。今年九月份我们还要开一个国际性的故宫学学术研讨会，今天也是为开好下一次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对故宫学的看法建议，将对我们准备下一个会议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故宫学提出到现在有七年了，这几年应该说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引起一些同仁的兴趣，但作为一个学科或者学问，要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水平，我想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今天，我想谈几点感想。

一个是故宫学的提出，可以说缘于我对故宫整体性的认识。故宫的文物藏品、故宫的古建筑，故宫拥有这么长的历史，是和它作为明清皇宫491年间所发生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故宫学的基础是在这儿。举个例子，三希堂的三件书法作品，任何人都可以研究，搞书法的，搞艺术的，搞历史的，任何人都可以谈王羲之的艺术成就，谈王献之的生平，谈王珣《伯远帖》作为真迹的意义，但是这三件书法作品如何放在故宫里面，乾隆皇帝是如何得到的，出于何种原因把这三件集中在一起。三件法书上，乾隆皇帝题跋那么多，把所有题跋和当时发生的军国大事联系起来，和乾隆皇帝的艺术趣味、审美观点联系起来，我想，这就不同于一般的书法或艺术史的研究，这就是典型的故宫学研究。

其次，循故宫学这个思路，还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博物院既是一个管理故宫的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我们对外展示，同时也负责修复它保护它。这里面就牵涉到对文物的态度问题，即是不是用故宫学的观点来看文物。例如，半年前古书画部说有一批乾隆御稿，有乾隆皇帝写的诗文原稿，也有大臣给他抄的诗文。我去看了，放在两个雕漆箱子里，按年代分的，有的一年分两卷，挑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没有目录，以前院里没有整理过，没有记录。图书馆也跟我说藏有乾隆手稿，我也去看

了，也是乾隆御稿，放在一个普通的木箱子里，与古书画部所藏应是一回事，恐怕是原来箱子丢了，现合起来估计有四五万件。我为什么谈这个？是因为这些藏品过去未引起我们的重视，未当作文物看待，也从未进行过整理。当然现在已着手进行。是否用故宫学的视野来看故宫文物或遗存，会造成对文物价值认识上的巨大差异。我们传统的文物观念是古董，即所谓的铜、瓷、书画等。有不少宫廷遗物过去都处理了。现在如果从故宫学来看处理掉的东西，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确实是宫廷历史文化的不同载体，其本身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还有许多宫廷遗存，过去我们没有完全当作文物，或者说没有作为重要的文物看待；还有一些残损而又有相当价值的文物，就是因为我们对文物认识上的缺陷，没有把它们当文物，有些仅当作文物资料。我们对很多物品的认识，没有把它们提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对其价值的认识亦产生了偏差。还有古建筑，因为故宫解放以后长期是一个艺术类的博物馆，虽然我们对故宫的古建筑还是重视，但是因为它与博物馆的展示有矛盾，我们也拆改了不少。像慈宁宫大佛殿几千件文物一下送到洛阳去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也应该看到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今天则要吸取当年的教训。还有一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钟表维修、书画装裱、青铜器修复等，都是清宫流传下来的，这些工艺技术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从故宫学的观点来看，故宫的保护就是全面的保护、整体的保护，看得见的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看不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护。

再者，故宫的学术研究并不都属于故宫学，作为一个博物院，各种研究都是很必要的。比如说艺术史中绘画、青铜器等的研究，只有当这些研究和故宫藏品以及故宫结合起来，才属于故宫学的范畴。此外，故宫也是有延伸性的，包括明清皇家建筑，包括流散在海内外的清宫旧藏，这在客观上也给更多的机构和人介入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而这些东西只有和故宫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才具有新的内容。

这几年我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逐步展开交流。我有一个观点，人为的阻隔只能是暂时的，两岸故宫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特别是故宫学研究，是发展两岸故宫关系的内在动力。两岸故宫本身就是血脉相连的，你要把学问搞好，不能不知道对方的研究成果，它的研究水平怎么样，写了些什么文章。我认为，正因为这么一种联系，包括和南京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和上海博物馆，和吉林博物馆等，都是可以开展合作的。

还有，我们的学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与单纯的社科类研究机构有所不同，学术成果不仅可以出版著作或发表论文来反映，而且我们还有展览，展览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具体的东西，包括促进社会教育，这都是我们的成果。近年来，我们对故宫博物院历史上学人的著作正在进行整理出版；也为一些年轻人提供了“紫禁书系”这个平台。另外，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我们的藏品，现在正在搞一个500多卷的“藏品大系”，向社会公开；此外还有《故宫百科全书》、故宫建筑大事记等的出版。故宫要有开放的气度，故宫学光靠故宫自身的科研力量是承担不了的，所以我们正逐步与社会合作、与海内外合作。

最后一个就是学科的理论建设，学科建设是比较复杂的，从理性上理论上探讨，这也是我们在努力

做的。敦煌研究院罗院长曾说，敦煌学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争论肯定有，但每争论一次总有新的启发，新的进步。这个还包括大家刚才说到的学科的性质问题，包括表述的方式问题，研究对象问题，研究方法问题，我想这是永远都会讨论下去的，但是每讨论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罗青（台湾师范大学语言中心主任）：“故宫学”可分为三大部分来讨论。第一部分，是当前具有博物馆及美术馆双重身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不单负责历代文物的搜集典藏、保护维修、研究评价，同时也负责教育传播、展览推广、复制交流，是一个多功能的文教机构；第二部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坐落之处——紫禁城，而此一原址的范畴，应该包括故宫本身、皇家园林及其四周邻近的民宅，是文化古迹及文化遗产；第三部分，则应包括曾在故宫内外活动的尊卑人物、所发生的事件及文物遗存。三个部分中，包括了语言学、科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文艺学、音乐学、建筑学等各种学门与研究课题。

因此，“故宫学”应当是一门属于“科际整合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ynthetic study）的综合同学问。从语言学开始，上述各种主题学门，都形成一套自给自足的“记号系统”，各有其独特的字汇词汇、文法关系与表达方式。“故宫学”的目的，在于研究解释这些不同记号系统的异同，从而发现蕴含其中的基本“运作模式”与原型“思考模式”，而这些模式，便是中华文化的“公分母”与“发动机”，产生了各种价值辉煌的思想体系【参见表一】。彻底掌握这些模式的构造，对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过去成就，创造规划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当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表一]“故宫学”与记号学、语构学、语意学及语用学

记号学Semiotics	语构学syntactic	语意学semantic	语用学pragmatic
	字素：字音/字型 morphemic/ phonology/graphology	字汇/文法/语域 laxica-/ grammar/ register	情境/文脉/文化 Situational/context/ culture
实体记号系统	紫禁城建筑、林园、尊 卑人物及周围民居	紫禁城内之尊卑人物 活动及相关文物	博物馆美术馆:故宫博物院
文字图像象征系统	宫庭人物：帝王将相， 嫔妃宫女，太监杂役… 宫庭文物：生活礼仪， 服装挂饰，宗教用品， 文房家具，戏曲乐器… 史料档案：文字史料， 典章制度，用具图籍…	文物收藏：书画，陶瓷， 玉器，铜器，织绣， 文房，钱币， 典籍收藏：图书，地图	保存维修典藏 科技研究复制 新增收藏 当代收藏
思想观念系统	思考模式：主题及补充模式 二元对立及补充模式 运作模式：分解成最小单 元再加以组合，图谱模式	思想体系： 哲学，史学，政治学， 文学，美学	价值评估：研究、诠释、 评价、展览教育推广普 及世界多层次交流

故宫及其文物，相对而言是属于过去的、静态的，而故宫博物院则是属于现在的、动态的。博物院不单是一个研究诠释、保护维修、展览推广的教育机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追求“复杂时代价值评估与生产”的文化产业机构。作为中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动机，故宫博物院所可以对当今世界提供的文化产值，其金额难以估算。

我想，故宫学尤其需要汇集更多的力量，也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学牵涉到的学门很多，范围很广，资源和技术的整合研究是近20多年来学术发展的趋势。

**朱诚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我理解郑院长倡导的故宫学，它的核心就是研究故宫的人和物。故宫学的特点是它的唯一性和特殊性。唯一性就是以皇帝为核心进行研究，围绕皇帝、皇宫和皇权，故宫学在此方面可以说弥补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国同构”制度，故宫学包涵的宫廷典制、宫廷建筑、宫廷收藏等，正是我们新修清史缺失的部分，这对研究清史非常重要。其特殊性在于，在故宫学中，明清宫廷史与同时期的建筑、器物、文献、档案、书画、宗教、民俗、科技等物质存在互为表里，互相印证，这也说明，故宫学较历史学有其独立和多样的发展空间。

其次，依托故宫的宫廷史学会成立已经快20年了，学会每两年开一次会、出一本论文集，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这个队伍我称它为故宫学者群，其研究领域均属于故宫学范畴。从第九届国际清史讨论会开始，连续五届都是故宫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来主持，故宫始终起一个主导作用。此外，故宫学者和院外学者合编了《清朝通史》，是现今规模最大的清代通史著作，这是故宫对清史研究的贡献。

清官史研究为故宫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外延已经扩大到所有对皇帝、皇权有关的研究。我们需要作一个规划，把清官史研究作为故宫学的一个分支完善和丰富起来，先从典制开始，明朝已经作了18卷的规划，清朝这次作26卷的规划，至少我们把故宫里面每一个典章制度摸清楚了，写出一部专著，从清官史方面为后人研究故宫学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故宫学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故宫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术领域。故宫学的提出，使围绕故宫的各种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散漫走向系统。另一方面，故宫学也是研究明清历史的新路径，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学问。

故宫学所包含的学科就其大端而言，有博物馆学、文物学、历史学、文化学。故宫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系统性。其研究区域，以紫禁城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宫室建筑、传世器物、馆藏文物、原始档案、历史文献，缺一不可成为故宫学。故宫学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模拟和复制的整体学问。离开故宫，故宫学就不成立。而故宫建筑与建筑之间、建筑与器物之间，各种器物的关联和位置经营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场景氛围，都是特殊的研究对象。

既然故宫学的特点是综合的、系统的，那么，在研究上就强调整体，强调联系。这就需要对它的研究对象进行整合，以确保它的整体性、完整性。首先，应使故宫的文物、文献尽量完整复原、复位。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应强调对宫室、文物、文献的整体研究，如果就各项内容进行分别研究则失去了故宫学的意义。如果脱离故宫的文物和环境，即使研究明清史也能算是故宫学。最后，各学科的参与构成



了故宫学的整体，故宫学应注重强调各个学科的交叉、渗透与结合。从各个学科出发研究历史，其终极目的都是回归历史本身。对一座建筑，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件器物的研究，如果同时从各个学科的角度进行考察，它还原的将是丰满的、立体的历史，当然也是得以更深刻理解、认识的历史。不是说每一个课题都必须、都能够这样做，而是说在故宫学的范畴内每一项研究，都应该有这样的整体观照。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把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近年我多次提出历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即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物之外再加上田野调查，包括遗址考察、民俗考察和口述历史。二重胜于一重，三重胜于二重。而故宫学可谓多重的、立体的学术架构，其优势是显然的。

虽然如此，故宫学并不限于故宫。如果仅就故宫开展故宫学研究，许多课题是无法达成目的的。比如，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大礼议，虽然发生在故宫，但其涉及的范围却十分宽广。就地面文物而言，举其要者，湖北钟祥的明显陵自无异议，北京的坛庙，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也都应在其中，因为大礼议引出了嘉靖帝的一段制礼作乐的热情，不仅改造增广天坛，而且分别建设了地坛、日坛、月坛；至于而北京昌平的康陵、永陵也不能至于视野之外。所以，以故宫学的大框架而言，所有关联的文物、遗址、文献，都应在研究中加以整合。

故宫学是一个新兴的、有广阔拓展、延伸的学术领域，是可持续发展的。陈寅恪说过：“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清王朝被推翻后，故宫之门大开，故宫及其文物、文献都成了学术研究的新材料。故宫学这一学术新潮流于此滥觞。如今，应郑院长召唤，我们得以预故宫学之新潮流，其幸何似哉！惟故宫学之本义，将宫室、文物、文献合为一体，作系统、综合之学问，吾等专以文献治史者，欲得亲炙宫室文物，尚有待焉。

**孙机（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第一故宫学不是故宫博物院学，否则各博物馆都有馆学就乱了，故宫学就限于明清，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学就是研究明清的宫廷史。当然这个学科是要交叉的，交叉是指研究方向的交叉，不是基本内容交叉，如果基本内容交叉，就没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故宫学是以故宫作为一个载体研究明清宫廷史。另外，故宫作为一个博物馆还要研究博物馆学、古器物学等等，比如陶瓷研究中心要研究历代的陶瓷器，但那些既非明清官窑又不是宫廷旧藏的器物，就不属于故宫学的范围了。

我觉得，故宫学就是作为明清宫廷史研究，它里面的学问也很大，范围也很广，很多东西研究起来也是研究不完的。另外就是“故宫”这个词，是明萧洵在《故宫遗录》中最先使用的，明初的建筑是以元大内为参考，研究元故宫，无疑有助于理清明清宫殿布局之渊源，那么，作为故宫学要不要从元故宫说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华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首先，敦煌学与故宫学发展阶段大致相同。敦煌学是“因地名学”，在1930年陈寅恪先生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首次使用了“敦煌学”这一概念。早期

的敦煌学，主要是对藏经洞文献的整理、刊布、研究；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有系统地、有组织的临摹、研究，以及石窟本体的保护。敦煌藏经洞文献和石窟艺术因此成为敦煌学最初的两大支柱。时至今日，敦煌学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原有单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其领域不断扩展，现在一种以保护、研究、弘扬为主调的“大敦煌学”概念日益形成，得到更多专家学者、乃至普通游客的认同。故宫学的提出也有其必然性，它有八十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与基础，其独特的内涵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在故宫学的发端可以说是以清宫档案的刊布为契机，引起知识界对宫廷历史、禁府秘藏的兴趣，80多年来，构建了以故宫古建筑、文物收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程六方面为主体的学术体系，并且具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敦煌学与故宫学都有海内外的一致参与。1908年开始敦煌的大量文献流到海外，包括日本、俄罗斯、法国等，国外从整理藏经洞目录入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分布的广泛性，就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研究中。同样，大量的故宫文物散佚海内外，也为更多的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最后，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都是开放和发展的学科。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决定了它们开放性的学术特征。同时，还应开展学术史的梳理和各自理论体系的探讨，开创既是学科自身的发展要求，又是时代精神需求的故宫学。

**龚良（南京博物院院长）：**明清两代皇帝居住的宫城叫紫禁城，一座在南京，一座在北京，南京故宫和北京故宫有直接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南京还没有有意识地开展故宫学研究，也没有形成学者群，但是南京有研究故宫学的基础。第一，我们要充分认识故宫学研究对南京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华文化的意义。第二，南京故宫学研究的范畴我想应该包括明故宫遗址、明清故宫文物，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史料、事物、制度、事件等。第三，南京进行故宫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明故宫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明故宫遗址保护文物的利用研究，故宫与明孝陵的关系等，明清故宫传世文物的研究，以及故宫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故宫及故宫的文物服务社会及公众的研究。第四，南京也有一支研究队伍，只是大家没有聚在一起，诸如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南京遗址保护人员以及南京大学等高校明清史研究人员，还有各个高校城市规划、古建筑保护人员，还有江苏省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干部队伍，只要把课题题目提出来，我们这些队伍一定会开展故宫学研究的。第五，研究方法，要将大家谈到的史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考古学的方法跟今天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跟今天社会发展要求的实践来结合。比如我们江苏就是结合江苏的文物事业发展跟民生的主题，江苏小康社会的主题结合，也就是研究要跟保护结合，保护要跟发挥故宫的影响力来结合。第六，南京博物院跟故宫博物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渊源的，最早南京博物院建立在南京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故宫文物到了以后，又在南京设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此后国民政府又将南迁文物调到中央文物筹备处。然后文物西迁，一部分到台湾，一部分留北京，一部分在南京。所以说，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沈阳博物院，都应该发展我们的事业。下一步我们要在故宫博物院的指导下，把故宫的文物保存好、研究好、利用好，多向大家学习。

**武斌（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2004年10月，我到沈阳故宫做院长，也是在那时了解了郑院长倡导的“故宫学”，我提出一个口号，要将沈阳故宫的学术研究纳入故宫学的范畴。几年来，我们研究学习故宫学有两个成果：一个是我写的《故宫学在沈阳故宫的扩展》，我提出了一个理念，将沈阳故宫既有的学术研究纳入故宫学的框架之下，也开了几个学术研讨会，编了一套书“沈阳故宫文库”，现在已经出了七本了，准备明年我们院85年院庆多出几本；第二是恢复了《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过去有过，后来停了好几年，现在变成正式出版物，这是实际成果。

另外，我还想谈谈故宫学的学术品格。我概括为三点：一是学术性，突出它的理论性内涵；二是人文性，突出文物的文化特点；三是实践性，故宫学在沈阳故宫的实践拓展应用就是它的实践性的体现。

再有，我想谈谈故宫学对于博物馆学术研究的启发价值。博物馆讲收藏展示研究，我看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是什么呢？是实证性研究，是技术的研究，是对文物的本体研究，缺少一些东西，缺文化、缺人文精神，而且缺少理论性。而故宫学对于博物馆学术研究的启发就在于，它使博物馆的学术研究自觉地由技术性向理论性转变，由实证性向文化性转变。所以，故宫学的创立，不仅仅是对于故宫文化群的研究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提升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品格都有相当大的启发价值。

**阎崇年（北京市满学学会会长）：**“故宫学”研讨会，很必要，很及时，也很好。我就故宫学的学科建设，谈四点想法，向郑欣森院长、向各位专家求教。

第一，学术历史的积淀。七年前，故宫博物院郑欣森院长提出“故宫学”——创立故宫学的新学科。创立一个新的学科，需要胆识，需要学养，需要积累，需要睿见。郑院长创议故宫学之初，我表示赞成，也极力支持。这七年来故宫学的学术发展证明，故宫学的提出是具有创新性的，使研究人员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各个学科的研究整合到一起。例如，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古建研究中心、陶瓷研究中心、书画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和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2008年故宫博物院与沈阳故宫博物院，2010年故宫和武当山相关部门，今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近年来，郑欣森院长连续发表十四篇阐述故宫学的重要论文，如《紫禁内外》（2008年8月出版）的《紫禁城的学问》；《天府永藏》（2008年8月出版）的《故宫文物与故宫、故宫学》、《故宫学视野》；《守望经典》（2008年12月出版）的《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谈谈故宫的大修及故宫学研究》、《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世界》、《从故宫学到鲁迅精神》、《故宫学：故宫研究的新阶段》；《故宫与故宫学》（2009年2月出版）的《故宫学述略》、《故宫、故宫文化与故宫学》、《紫禁城与故宫学》、《清史研究与故宫学》、《明官史研究与故宫学》、《探索故宫学的体会》等。上述事例说明，七年来，既从学术理论上，又从学术实践上，为故宫学的学科建设奠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学术发展的必然。学术历史的发展，学科之间的分合，大体上经过了一个“合一—分—合”的过程。就是先经过综合发端，后经过分科演进，再形成综合发展。比如经、史、子、集中的史学，太史公司马迁那个时候，分科不细，比较综合。后来分断代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逐渐形成断代史的体系；后来又分专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近些年来，受西方史学影响，出现更细的分科，

如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民族史学等等。但是，学科的发展不光是由合到分，而且是由分到合。学科的发展，分到一定阶段，又走向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九派归一。故宫学的提出是“九九归一”，将故宫学研究中的古建筑学、古器物学、古陶瓷学、古书画学、明清宫廷史学、明清文献学、明清档案学、宫廷管理学、宫廷礼制学等，加以整合，竞相发展。总之，故宫学就是关于故宫各个学科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具体实证。整合各方学术力量，共同推动学术发展，进而推动故宫学的发展。

第三，故宫学的内涵与外延。郑院长在《故宫与故宫学》书里，以及在《禁城内外》、《天府永藏》、《守望经典》中，对故宫学相关的问题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阐述。我个人觉得故宫学研究的内涵是故宫，这个大家没有异议；但其外延的范围与程度，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内涵的核心就是明清故宫，因为明清故宫的古建、文物、宫廷等基本上还看得见，所以一切以存在故宫的建筑、历史文物等等为中心来研究故宫学。然而，在时间与空间上我建议要延展一下——于时间，把明清时代故宫和历史上宫殿前后发展适当科学地链接；于空间，延伸紫禁城以外，如北京的“五坛八庙”，以及其他皇家庙宇，还有皇家园林、皇家寺庙、避暑山庄、明十三陵、清东西陵等。再外延就是外地了，北边的沈故宫博物院和关外三陵、三京（兴京、东京、盛京），南面的明三京（明中都、明初北京汴梁、南京）以及明孝陵和承天府湖北安陆等。海外比如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该院周功鑫院长很认同郑院长的故宫学，而且也要积极参与。我想还可以扩大，亚洲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泰国、琉球等等，还有欧洲，他们同故宫的双向文化影响，也是故宫学外延需要注意的问题。《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世界》——这是故宫学外延的生动阐述。还有，故宫的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典制学、医药学等。故宫管理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它的管理有些什么历史经验、历史教训也是值得研究的。还有皇帝的养生学，此外宫廷的服饰、娱乐等。我想，社会有多个学科，故宫就有多少内容，故宫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中华各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第四，一个建议。我建议成立故宫研究院，或者故宫学研究院，因为故宫学研究需要一个基地、一个平台、一支学术队伍。这支学术队伍，以故宫博物院研究专家为基础，适当吸收各地各方专家学者参与，通力协作，共同研究。这事比较难，慢慢地争取，把这件事一步一步做成、做好。

最后，郑欣淼院长在《丑牛集》中的七言绝句云：“鼓吹七载起波澜，笔翰磨人鬓已斑。我愿诸公多顾念，故宫之学显瀛寰。”大家携手，同心合力，促故宫学，彰显于世。

**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郑院长提出故宫学恰逢其时，我们今天正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故宫学的提出很必要。故宫学的研究范围，一个就是紫禁城本身，其他以明清故宫为重点，但又不限制于明清。此外，郑院长所提并不限于明清，还应该范围更大，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年。宫殿或者宫廷建筑研究，有重点也还不能只限于这个北京故宫，就比如明清宫殿，元朝也在这个遗址上，但是比较少了。其他需要延伸的还很多，除了南京，还有中都凤阳等等；建筑形制还影响到国外，比如韩国、日本等国，它们的很多建筑都是仿照我们中国的。

建筑是一个载体，其学术内涵除了体现在建筑物本身，还有其文化内涵、其空间所发生的活动，另



外还有它的藏品，故宫的藏品跟故宫不能分开。此外，故宫作为一个博物院，还要为今天的社会服务，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保护和维修很重要。今天提出的文物保护十六字方针里，有一个叫“合理利用”，就是要让它为今天社会发挥作用。古建维修过去我们都一直说“带病延年”，实际上带病延不了年！比如此次大修的太和殿柱础，已经糟朽了，如果不加以替补墩接就有危险，必须把这个病去掉才能延年，否则就会塌下来。经过专家多次现场考察论证，还是去了病。所以郑院长提出叫“祛病延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应当大力宣传。我建议以故宫学的名义开个学术研讨会。我们不仅要祛病延年，还要起死回生，要让它重新辉煌。说到修复，故宫的西花园，原来是废墟一片，现在修起来了，也使故宫的完整性有了。这也应该作为故宫学研究的内容吧。

我看故宫学的内容太丰富了，跟它相关联的也太多了。故宫这个建筑是3000年城市建设的精华，体现了3000年左祖右社礼制建筑的精髓。研究建筑的历史可以在故宫的保护维修中发挥作用，此类内容还很多。我想，故宫学的提出，既有多年的积累，还要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现在还是方兴未艾，我衷心祝愿故宫学不断地形成、丰富、发展，有利当今，传之后世。

**葛承雍（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自从2003年郑院长提出“故宫学”后，七年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学术热点。从理论上说，“故宫学”是一个“理念”还是“思辨”，是一个“主体”还是一个“主题”，是一个“有限特指对象”还是一个“无限学科总体”，是实践理性对象还是提供独特视角，这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可以说，故宫学的提法开启了一种新思维，唤起了学术研究从自发到自觉的重要转折，这种觉醒具有活力的特质，为人们主动介入故宫学术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也克服了思想上的“断裂带”和主观上设定的宫内、宫外的“分界线”，有益于提高中华文化整体研究水平。

但是，“故宫学”不能被虚化为纯粹的概念符号，那将失去与实际研究的融会的结合点。我认为，作为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故宫学应该更加扩展视野，容纳丰富内涵，承续多元文化，体现时代特征。一，故宫是皇宫类博物院，但故宫学不是局限在皇宫旧院内。故宫学不应设置“门槛”，无论是上层统治阶级还是民间下层社会的文化，都会对故宫研究有所补充、有所裨益。现在故宫将收藏的文物精品陆续公布出版，提供给全社会进行研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有很多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博物馆的私产。二，尽管故宫是皇家建筑的最高殿堂，但故宫学还没有达到学术的巅峰。尽管郑院长几年来大力倡导，然而在社会上和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支大军，“回影自怜地，各扫门前雪”现象还严重。我们必须认识到故宫是中华文化孕育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成果，它既与明清皇家具体的活动有机统一，又与整个古代社会的文化有机统一。特别是中西对比研究中，故宫明清以来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吸纳研究还亟需扩展，正如郑院长说的：“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全世界。”三，故宫是各类文物的汇集地，但“故宫学”不是一个博物馆行业性汇总。郑新淼院长在《故宫学述略》中勾勒了六个方面，但实际上应不断增加范畴。例如，明清两代皇家狩猎、明清漕运和京师仓库等，很多方面与宫廷消费密切相关，故宫学应不断加以扩充。

此外，在斥巨资重建假古董，推动今世经济利益的形势下，“故宫学”亟需文化底蕴做理论支撑。

只有学术观念的进步，才能推动一门学科的持久发展；只有成熟的“故宫学”，才能保障故宫真正地在世界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故宫学是客观存在的，不仅是因为故宫博物院有着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八十余年的科研历史，更因为近年郑欣淼院长等对故宫学建设的不断探索与倡导。故宫学的明确提出，是故宫的科研以及与故宫相关诸学问、工作的一种自觉。

关于的学科的建设，西方科学学与科学哲学中已经有一系列的经典理论，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体系包括学科的运作等，都有具体的标准与指导，比如库恩的科学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就故宫学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当下我们所谈论的故宫学到底是学科还是学问？大致的判断应该是正处于由学问向学科迈进的过程中。作为一门学科的故宫学的构建，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包括在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中，确立故宫学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构筑故宫学立论的基础；围绕硬核构筑故宫学的辅助性展开地带，这个部分既是对故宫学基本硬核的深化与完善，也是故宫学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发生关联的桥梁纽带；此外，还要丰富、完善和发展故宫学的研究纲领和科学共同体、学术阵地等的建设。

具体到故宫学的内容与形式，似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或者方面：

一是故宫本体学研究。故宫的科研、学术等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和一门庞杂的学问，其核心是以明清故宫为载体的关于宫廷建筑、宫廷文物及其所体现的宫廷史与帝王文化的研究。在这里，文物是文化的物化，研究文物最终需要上升到与其关联的人以及被物化的文化本身。因此，对故宫的文物建筑古迹、其相应的典章制度、精神文化以及相关人事展开关联的、系统的、跨学科的研究，是故宫学最基础的圈层。

二是关于皇家文化、帝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研究。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最为连续、体系最为庞大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从旧石器时代到社会分化国家产生、封建帝国，乃至于现代化，人类文化进步的所有关键性阶段无不具备，正确认识这个过程及其所蕴含的文化规律，不仅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客观需要，也是把握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参照。故宫虽然集中体现帝王文化、皇家文化，但是它孕育并肇基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与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族文化、基层文化都有易曲同工及相合支撑的关系。而以人类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观察，故宫学所主要面对的皇家文化与帝王文化正是古代中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封建正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因此，要客观地阐释故宫学的意义，无疑应该在这样宏观的视角下为相关文物与文化研究寻找到合理的定位。

三是关于故宫现象及故宫作为文化遗产的认识与探索。故宫的历史、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缩影。皇家收藏本是中国历史上与封建统治正统性相关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故宫藏品的选藏、流转包括抗战中的文物南迁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设，更有着另一层次的文化意义。近代故宫从王宫到博物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角色转换，与中国文化的变革、进步、觉醒、复兴更是有着无法割裂的紧密联系。今天作为博物院和世界遗产、向全人类开放的故宫学研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更

是对故宫价值的不断挖掘、阐释和展示。因此，历史上的故宫现象以及作为文化遗产的故宫的价值挖掘、保护、传播、管理等，当然也应该是故宫学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

总之，故宫学的提出与探索，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和统领故宫科研与工作的一种时代自觉，是故宫相关的科研与工作发展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既是故宫博物院80余年的历史进步过程的不断自觉、提高和升华的结果，也是故宫不断融入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对自身的特色与定位逐渐明确的表现。故宫学与探索当然不能仅仅限于故宫和故宫博物院，不过，由故宫及故宫博物院倡导故宫学的建设，对于故宫学科学共同体及科学研究纲领、范式等构建则具有先天的优势。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经过充分的筹划与准备，与故宫本体研究相关的一系列学术中心的建设与探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甚至有专家提议建立更加综合性的故宫研究院，都是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如果能够经过精心的设计，以故宫为依托，建立一个高规格的故宫论坛或许更有意义并更具操作性。这个论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集当代世界之文化精英，集中、定期探讨故宫与皇家文化、帝王文化、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之关系，提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上层文化与基层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融合及共荣发展，朝着文化建设领域的博鳌论坛、达沃斯论坛努力，一定会对故宫学、对中华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不可限量的贡献。

**林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对于故宫学的研究，我们应该注意中国文化自主的体系和民族性特征。故宫是我国文物收藏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最集中最精粹的无可争议的代表。所以，我们在研究中要坚持民族思维模式。

例如，在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中，现实主义一直被认为是美术史发展的主线。甚至有一部中国美术史，就是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的观点。在对故宫重要藏品《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其的基本定位是现实主义性质，称：“它乃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创作之一。”这基本上是一个定论。然而现实主义是西方立足于其科学理性思维的一种文艺流派，它的基本特征除了忠实于现实之外，还要以典型形象反映历史的本质规律。但中国的古典艺术即使是写实艺术中，却从来没有此种追求。当我们对《清明上河图》完整的方位环境图像进行考证时，就很难完全符合文献的记载。例如对虹桥与其旁边城楼的认定，不少研究者从《东京梦华录》中虹桥与城楼的形态位置描述中寻找画面中两者的关系，就陷入研究的死胡同。于是另寻他途，又引出千奇百怪的种种猜测式结论。但是，如果从中国艺术的意象性质出发，张择端就半点错也没有。

又如故宫所藏董其昌、“四王”的画甚多。“四王”的画一向被美术史家们视为复古而受到尖锐批判。董其昌“四王”们有仿古之说，但他们又何曾好古而不创造。董其昌便有“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之说，力倡笔墨的新论。实际上，“四王”们所以口口声声仿古，也因为当时之复古与今天之创新一样，都是时尚与时髦。

类似的例子多而又多，难以枚举。这种以西方思维取代东方思维的倾向已经持续了近百年，以致有人以“失语症”来形容今天中国学界的尴尬。看来，在面对中华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故宫文化之研究



时，这种问题的解决就更为必要更为迫切了。

**晋宏逵（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郑院长提出“故宫学”是基于“故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整体”的认识。他归纳了故宫学的六个主要研究领域，而这六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陈寅恪先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学发端于明清历史档案的发现和故宫从皇宫转化为博物院这两个历史事件。故宫古建筑、宫廷收藏和明清档案是故宫学研究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把持续整理和发布故宫典藏、文献档案作为发展故宫学的重要任务。

就故宫古建筑的研究而言，对古建筑本体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明清档案的整理极大地提高了明清建筑史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所做一项泽被后世的工作，即保护、整理和及时刊布故宫文物，成为优秀的传统。故宫文献馆整理档案，包括内务府、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和图籍四类。其中军机处档案于民国三年移交当时国民政府国务院，藏中南海集灵囿。民国十五年经故宫博物院动议复移交故宫博物院，藏大高玄殿。内务府档案中关于营造的史料比较集中。著名的清内府藏乾隆《京城全图》即于1933年6月至34年12月期间在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发现。为了刊布成果，文献馆从民国十九年起出版《文献丛编》，基本做到了月刊。其间为发布清三藩史料出版了六册增刊。此外，为了发表馆内外同仁贤达的研究，民国24年出版了《文献特刊》，后更名《文献论丛》，作为故宫博物院纪念刊。

中国现代学术基本是在同一时期多方面开端。1929年，出于爱国知识分子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抢救保护中国古建筑这门“绝学”，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学社开创了中国营造学科，明确地提出了学科研究对象、目标，概括了方法论，在17年的实践中，为学科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学社特别注意古建筑资料的搜集整理。搜集整理对象包括文献，也包括对营造实物、图样的调查记录，还有访问匠师。1930年，当得知主持清代官工样子房的雷氏后人因生活拮据，要出售样式雷图档时，学社多方呼吁，积极筹款，使这批珍贵资料得以收藏在公立的学术机构。整理发布样式雷资料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刘敦桢先生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他的整理综合了传统正史记载，样式雷图和烫样，清代工程做法和则例，还有清宫档案。用这四方面的史料完整地复原了清代同治年间对外讳莫如深的圆明园重修工程的历史过程和各工程项目的进展情况，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增加了信史，为后代学人树立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典范。

温故而知新。时至今日，各学术机构对明清史料的整理成果之丰富，较之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对营造史料的整理和发布，则由于它的特殊专业性，还不能满足学人研究宫廷建筑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收藏机构不同，所形成的对史料的分别管理，给营造史料的系统整理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可行的办法，是各收藏单位分投整理发布所藏部分，整理时组织相应的专家组，用共同的标准，进行辨识著录。我认为样式雷图档和清代匠作则例的整理是当务之急，

20世纪30年代统计，样式雷烫样收藏在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故宫所藏均是当年进呈、留中未



发者，与雷家图样做法估册档案相合。图样在北平图书馆者约3/4，中法大学者约1/4。后来中法大学所藏图档经单士元先生之手入藏我院。所以营造学社建议：“希望各部分所有图型集中一处，汇合整理。查雷家图样名目，有白样，有糙样，有细样，有寸样，二分样，一分样，有进呈者，有留底者，有重改样，同地名异，由于标写不清，遂致难于辨别，如果汰其重复，传写异样，分工合作，不期年彼此皆成为有系属之完本。”（民国21年《本社纪事》，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册）最近，中国紫禁城学会申报故宫博物院批准，将整理院藏样式雷图档和烫样作为学会的科研任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学会一定妥善组织，使它们成为“有系属之完本”的一部分。

1937年，故宫博物院曾印行《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则例者，聚已成之事，删定编次之也。”（故宫博物院印行《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序）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整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成果编著为《清式营造则例》，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课本。1960年，王世襄先生开始搜集整理匠作则例，按“作”进行汇编。文革中工作终止。1995年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成立，将影印和校译匠作则例作为该会重点课题。目前所见，原文刊布类有大象出版社影印中国文物研究所藏《内廷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圆明园、万寿山、内廷三处汇同则例》出版。辑录汇编类有2002年《佛作、门神作》、2008年《装修作、漆作、泥金作、油作》，两本均为王世襄先生编纂。注释类著作只有梁思成先生未完成稿“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 2006年出版。

经查，我院所藏则例有270余种之多。请教故宫图书馆朱馆长，院藏则例以通行本最多，也有少量抄本和内府刻本。由于匠作则例所记载和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工艺美术和手工业技术的最具体资料，对于辨识宫廷建筑各部分以及故宫器物、科学命名；对于传统技术的工具、材料和做法的认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都有着很大意义。因此建议将故宫藏则例的整理和刊布列入工作计划，它也是故宫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工作。

**王素（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学的内涵与外延，虽然与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存在相近之处，但却无法为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所包括和包容，这说明故宫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郑院长曾特别强调，故宫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在这里，我仅以故宫学所属故宫文献学为例，简要谈一谈故宫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故宫文献学至少可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明清档案三大研究领域。其中传世文献包括汉文刻本文献（四部书、大藏经）、汉文抄本文献（古籍、尺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土文献包括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金文、石刻及其他）、敦煌吐鲁番文献（古籍、文书、写经、墓砖及其他）；明清档案除去划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部分，故宫院内仍有名为文献类的清宫档案，包括舆图、内务府陈设档、“样式雷”建筑图档、清中晚期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清宫旧照片、清宫书版等。台北故宫也有当年南迁的清宫旧档，共39.5万件册，大致分宫中档案、军机处档案、内阁档案、史馆档案、舆图五类。

通过以上对故宫学所属故宫文献学的类别的进一步细化，可以看出，故宫文献学的内涵非常丰富，

外延非常宽广。学术界津津乐道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献、清宫旧藏明清档案，北京故宫已有其三。北京故宫虽然没有汉晋简牍，但有归于玺印类的汉代简牍上的封泥类文物345件，其中300件属官印，其余属私印，也非常有价值。甲骨文献的外延为甲骨学，封泥文物的外延为简牍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外延为敦煌吐鲁番学，清宫旧藏明清档案的外延为档案学。还有，四部书的外延涉及目录学、版本学，大藏经的外延涉及哲学、宗教学，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外延涉及语言学、民族学，金石文献的外延涉及金石学、考古学。即如尺牍、碑帖，也与法书、法帖存在延伸或交叉关系。故宫文献学的内涵已然如此丰富，外延已然如此宽广，故宫学的内涵与外延自然更为难测高深和难窥涯涘。因此，故宫学的发展大有前途！故宫学的研究也大有可为！

**刘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学的提出确实是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而自己要从两岸文物保管方式和文物研究思路的异同来谈对故宫学的认识。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上是将文物和原包装放在一起，而我们则从博物馆学角度对文物进行分类，把皇宫留下来的文物和原包装拆分开来了。比如，我在台北见到福康安的白海螺放在一个漆盒里，而在我们这里，肯定是漆盒进入古器物部，白海螺进入宫廷部宗教文物科了；还有一个乾隆的皇后给他缝的荷包，也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说明乾隆跟皇后的感情非常好，而在我们这里的话，荷包有可能进入织绣库，盒子则进入工艺库了。尽管没有提出故宫学，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种按照宫廷原状的方式加以保存，理念实际上就是故宫学的。

去年雍正文物大展的时候，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交流，他们对于我们把文物和包装拆分开来很吃惊。98年我们举办过一个包装展，这个办得很好，但同时觉得痛心疾首，特别漂亮的盛放玉器的东西，可里面没有玉器了，玉器进入玉器库了。如果有故宫学的理念，文物和包装物在一起，那对历史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了。我1976年来故宫工作，一开始是给文物冠号，原来存在的那些历史信息已经大大丢失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故宫学提出来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从学术研究上看，我觉得此前是不大强调故宫学的。比如说两岸对各自的书画研究，多是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比如说紫光阁功臣像，这是很有价值的，还没有进行研究，因为在绘画史上大概提不上来，但是从故宫学上讲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还有一些炮台图、练兵图、布阵图等，从故宫学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可是由于两岸故宫对书画的研究基本是以绘画史的角度进行选题，这些文物都被忽略。但是对器物的研究不太一样，特别是瓷器，珐琅，漆器这一类，明清宫廷所制造出来的这些器物的研究，那是从可以说比较符合故宫学的这个角度，那就要去查大量的宫廷档案，考查原因。在文物保护上，台北故宫这方面可归进故宫学的范畴。

我认为故宫学对两岸故宫的文物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石渠宝笈》收有四帝所绘所临的书画，除了年代标准外，收录的其他标准是什么；此外，《石渠宝笈》所藏书画的类别（卷、轴、册等）、题材分布、年代分布、作者分布，甚至这些书画在四帝心目中的意义，许多内容已大大超出美术史范畴，应该属于故宫学。考虑这些问题，将会对原来仅仅从艺术史角度对书画的研究大大扩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研究一定有利于加强两岸故宫的纽带。

故宫学有别于其他学科，它有明清史，和明清史不一样；它是艺术史，但包含有艺术史不关注的。从清史研究的角度，以图证史、以图补史是故宫学十分必要的。诸如《平定金川战图》，不知当年是否有宫廷画家随军前往金川，已经涉及到故宫学范畴的思考。所以，我想故宫学要真正建起来立得住的，就要有扣住故宫学内涵又有别于明清史等学术成果，做到这一点，故宫博物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科研处长）：**故宫学包容着故宫学派，和故宫学一样，故宫学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去总结和认识。故宫学理论的实践结果，就是故宫的研究者关注学科理论的建设 and 实践总结进而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故宫学派。学派的三个基本要素是：要有学科宗师和薪火相传的知名专家学者并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要有一整套独立的学科建设思想和理论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性成果。自古以来，相对于本专业的其他同行，学派标志着独特的学科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以艺术研究为例，在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国际上形成了美国东部学派和西部学派等，在国内，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等先生建立的“美学派”将审美意识注入到对古今艺术品的欣赏和研究之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艺术史的宏观把握。南京艺术学院俞剑华、温肇桐等先生开创的“俞剑华学派”强调对艺术史文献整理成目录、索引，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是编撰成《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大大提高了艺术史研究的效率。我院徐邦达等先生创立的“鉴定学派”，将传统的感性经验进阶为可以传授的学术知识，他们借鉴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把典籍、文献、图像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一件件古代书画的鉴定结论趋于客观，随着书画研究的不断深入，赋予鉴定以新的研究内容，如内容考辨、背景分析、画派研究等。

我院能够被称之为学派的还有陶瓷、古建等学科，如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创建的“窑址调查派”，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把对清宫藏陶瓷的鉴定研究追根寻源到历代窑址，目前将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分析个案已形成了新的研究特色。以单士元等先生开辟的“宫廷建筑派”将明清宫廷建筑档案的研究成果作为古建保护的基本依据，对清宫传统建筑工艺的研究，成为与民居、园陵建筑等鲜明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硕果。

故宫学派就是由诸多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派所组成的，就文物研究而言，其共性就是要求研究者以具体文物入手、以相关的文献档案为依据，做到以物证史、以史论物、史物结合、物物相证，力戒空论。由于各个学科的条件、机遇等综和因素的差异，学科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学科还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学科已进入到“学者群”的阶段，如宗教美术的研究、明清宫廷史的研究等等，形成学派规模、达到学派水平是其学术发展的未来方向。

建立在故宫文物研究基础上的故宫学派跨越了海峡两岸，两岸故宫在研究对象、治学理念上有许多共通、共鸣之处。故宫学派立足于故宫而面向世界，她将融入世界学派之林而有别于他人。